

众生·人民路

以生命的名义

| 高仲泰 文 |

还记得陆勇吗？他就是《我不是药神》的电影原型陆勇。我和陆勇约定这个春节期间见一次面，聊一些事情。在这之前，我已访谈他六七次，对他的故事已有足够了解。他授权我写一本关于他经历的非虚构小说，并改编成电视剧。

电影的热播，央视新闻主持人白岩松对他的采访，以及几十家报刊对他的报道，使他的义举广为传播，他的“药贩子”罪名得到昭雪，沅江市检察院在不起诉裁定书中写道：“如果认定陆勇的行为构成犯罪，将背离刑事司法应有的价值观，甚至是不道德的。”他的事迹改编电影上映后，引起了轰动，获得了巨大成功，陆勇也迅速蹿红，成了名人。

他确实很忙，电影播出后，引起有关方面重视，医治白血病的印度仿制药“格列卫”正式被列入了医保报销范围，他的使命完成了。但开着两家针织厂的他却忙得不可开交，他很少在家，大部分时间在印度，忙于将印度仿制药引进到中国生产，以惠及更多的患者。引进中国生产，并非那么简单，有法律问题、审批手续问题、投资问题，他为云南一家药厂与印度厂商牵线搭桥，来回奔波。他这样做，和他代购医治白血病的“格列卫”一样，是为了让白血病患者能更方便更经济地得到特效药品。

除夕前，我没有见到他，也没有他的音讯。除夕晚上，在餐馆吃年夜饭，武汉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爆发，人们惴惴不安，回家路上，冷雨笼罩，行人、车辆稀少，我想和他联系，告诉他换一个比较安全的地方碰头，如地旷人稀的体育公园，但想到大年三十打扰他不妥，便打消了这个念头。此后几天，在充满焦灼感的寂静中度过，情况越来越紧张。我终于给陆勇打了个电话，让我出乎意料的是，他在云南的一个机场，等候去印度的航班，他刚从印度回来两天，又要去了。他说，受国内某药厂的委托，他要去印度采购口罩等医疗防护用品，捐赠给重灾区武汉。他向我表示歉意，称这段时间不能见面了，有什么问题以后再说。说完，匆匆把电话挂掉了。

此后几天，阻击肺炎疫情已成为中国压倒一切的大事。我静下心来开始写陆勇纪实，翻阅着采访陆勇的记录，在这样一个特殊时刻，我愈加感到陆勇的伟大。说他是一个勇者、智者和仁者并不夸张。是的，他是一个平

凡的人，但他又是一个英雄，作为一个名牌大学的高材生，他与一般患者相比，知识面宽一些、人聪明一些、懂得外语，他是从英文期刊上发现印度仿制药的。在生死存亡的窘境中，在高额医药费的巨大压力下，他找到了一条活路。在拯救自己的同时，他开始拯救那些在死亡线上挣扎的病友，他无偿地为一千多患者代购印度仿制药，他拯救了一千多人的生命。他给无数在黑暗中等待病魔吞噬的人，送去了希望的火种，他是全国第一个慢粒白血病患者QQ互助群里的“普罗米修斯”，许多无望的人因为他传递的火种而看到了生的光亮。去年年底，他受邀到北大医学院演讲，当主持人介绍他时，全场起立，掌声经久不息。

白血病患者是一个小群体，而武汉疫情因为有传染性，所以会引起恐慌，从而牵动全国和世界。但灾难是无法比较的，对每个受苦的人，他的灾难都是最大的。同样，对于白血病患者来说，他们所承受的苦难一言难尽的，每个人都有长夜哭泣的经历。因此，他们对陆勇怀着深深的感激之情。然而，2013年陆勇代购抗癌救命药却遭逢法理困局，以“销售假药”罪行被关押了466天。之前，陆勇隐隐知道他代购药物的做法有一定风险，因为，按中国的有关规定，凡是国外药品，未经检验、批准而擅自进口，均按假药论处，但道德本能战胜了担心。让陆勇坦然的是，他在代购过程中，未收取分文利益。期间，上千名白血病患者联名上书为他请命，他们记着陆勇的恩。司法还是公正的，有温度的，最后陆勇被释放了，虽有过错，不足论罪，不予起诉。但毋庸讳言，陆勇在一年多时间里很受伤。

生命重于泰山。我们说，一个人要有济世情怀，见人难如己难，见人溺如己溺，而陆勇的身上所体现出来的人性的高贵，在于试服印度格列卫成功后，将这种生命的希望分享给了其他病友。

在病毒肆虐、疫情严峻之际，重温陆勇的故事是有现实意义的，陆勇说过：“我不是药神，我不是英雄，我只是个患者，只想平静的生活，过好我的小日子，做点自己喜欢做的事情。”他又说，“一旦重病缠身，平静的生活，充满烟火气的小日子是一种奢望。我和病友们的真实故事，不需太多改编，足以让观众落泪，更足以让观众感受到生命之光，感受爱的力量。”

抗击疫情，这是一场震天撼地的没有硝烟的战争。历史有惊人的相似，这一切似曾相识，仿佛是十七年前那场已经淡忘的非典的轮回，钟南山冲在前面，誓师和悲壮的告别，无数的医护人员砥砺前行，从国际到国内，捐助的物资源源不断运往伤痕累累的武汉三镇，包括陆勇到印度代购口罩了，我们在揪心的同时，感受到了中国的力量，感受到了生命之光，感受到了凝聚力，感受到了人间大爱！

无论什么时候，无论情况多糟糕，我们之中，总有那么一群最勇敢最担当的人，在关键时刻挺身而出。我一向觉得中国人中有最真诚的爱国主义者，他们是最崎岖处接引这个民族渡过一切苦海的纤夫……

正如《人民日报》一篇文章里说的那句话：“2020并不难，只是过于深刻地在告诫着生命的重要性，没有过不去的坎，只要命还在，一切还有机会。”

还是陆勇那句话：“挺住意味着一切。”



忆旧·古运河

虎丘卖猪记

| 周志伟 文 |

上世纪六七十年代，有个特殊的时期叫“农业学大寨”。每天清晨，老队长敲响挂在自家门前树上的钟，操着嘶哑的嗓子喊道：“上工了，上工了。”钟声三遍以后，村民三三两两拿着农具走出家门，等候队长派工下地干活。当时的农民除挣工分等待年终分红，平时没有任何经济来源。一年到头家里的油盐酱醋、草纸肥皂等要靠现金购买的生活必需品，都是捉襟见肘。有的农户不得不将自家老母鸡生的鸡蛋，七八分钱一个，拿到街上卖掉，所得的钱买回一块肥皂或一瓶酱油。

当时政府允许农民搞的副业只有一项，就是养猪。但规定，猪粪只能作为集体用肥，农户不能浇到自留地。每逢农历初三、十三、二十三，街上集镇有个类似庙会般的集市，我们都叫“落上”。四邻八乡的农民都会将土特产品、禽畜、家什上市交易。开春后，几乎每家都会到落上选购苗猪，家里人多选两只，人少的选一只。六七个月，苗猪长成了肉猪，可以出圈了。当家人心里喜滋滋的，因为卖掉大猪后就有钱改善下伙食，或给孩子们添衣裤、交学费了。当时公社生猪收购站负责收购生猪的师傅叫阿德，眼睛有点眨巴，农户把生猪抬上磅秤，他便从猪颈、猪肚、猪腿摸三下，毫无表情地喊道：“三等乙级，45元2角！”说完，便在猪的腹部剪几刀猪毛做记号。卖猪户总会哀求说，阿德师傅你再看看，我家的猪长得这么壮，能否再高点。阿德师傅抬起头，提高嗓音说道：“不卖扛回去！”扛回去说得轻松，这猪今天被一惊一吓，已掉了几斤肉，扛回去需再养一个礼拜才能长回来。再说家里猪饲料已吃完了，不卖也得卖了。数着卖猪的钱，心里叹息着，全家人辛苦了半年多，100斤毛猪只卖45元钱，这日子太难了。

说归说，怨归怨，到了第二年春天，农户们还是照常去落上选苗猪。又半年过去了，肉猪可以出圈了。但一想到阿德师傅那把剪刀，心里又凉了半截。就在这年，隔壁村上几位头脑灵活的兄长叔伯打听到，苏州虎丘生猪收购价比我们当地高。一只猪可多卖十几元钱。这不得了，十几元钱差不多一只苗猪价格了。当年，我们家养了两头肉猪。我和巷上几户村民商量，决定搏一记——去虎丘卖猪。但细细一想，从老家到虎丘需经过望亭、浒墅关，水路需40多里，

中午12时前必须赶到，靠摇船拉纤能行吗？我们盘算了一下，40多里水路必须5个小时以上，如早上6点钟前开船，中午应该能赶到虎丘。

到了卖猪那天，我妈半夜三四点钟就起来喂猪食，让猪多吃一点，因为多一斤重量就是多卖钱呀。早晨6时前，我们将七八头猪扛上水泥船，摇橹的摇橹，撑篙的撑篙，一起往苏州赶。到了塘河（大运河），我和裕民、建友三人上岸拉纤。阿南、伯寿两位稍年长的在船上掌舵、瞄纤。九月份的太阳还是蛮毒的。我们俯起身子，踩在一脚高一脚低的纤路上，奋力拉纤。不一会，我们三人已经汗流浹背了。约莫三个钟头，我们的船要过浒墅关了，集镇临河纤路断了，我们只得收起纤绳上船。回到船上，看着躺在船舱里被捆绑、被太阳灼烤的八头大猪，尽管同行的两位婶婶不断为它们浇水降温，还是不断地喘气，吐着白沫。想想路程才过半，不要“猪坚强”们坚持不到虎丘啊。怎么办？我们决定拖轮船、抢时间。说干就干，刚好有一列货轮由无锡往苏州方向开过。我们的船便往货船靠了上去。我和裕民先用力拉住货船船舷，建友用竹篙倒钩货船尾部，然后三人一起发力，拼命拉住竹篙。货船老大看到我们强行拖船，一会左满舵，一会右满舵，想调龙灯似地把我们甩掉。裕民见状，连忙用缆绳扣住，当舵的阿南、伯寿跟着将舵推扳变换，终于将船稳住。阿南叔来到船头与货船老大求情，说清我们是农民，家里养了猪要去苏州卖掉，太阳又毒，时间赶不及了，求他帮忙捎我们一段。货船老大见我们说的是实话，便点头允诺了。就这样，我们终于在中午休市前赶到了虎丘生猪收购站，将八头肥猪一一过磅。收猪师傅同样将猪从头到腿摸摸，用剪刀剪了三下猪毛报价：“二等甲级，54元6角！”我们几人听后不约而同露出了笑意。

走出收购站，我们都用手捂着装有卖猪钱的口袋，走进了山塘街的饭店。稍有口吃的伯寿对着我们几位说：“你们几位今天拉纤拖轮船辛苦了，点只糖醋排骨，这是上海的光明牌啤酒，来瓶尝尝吧。”我想今天肉猪卖了个好价钱，就开开洋荤吧。回家路上，我斜躺在船舱里，用草帽盖住了脸，打着啤酒的饱嗝，心想，回去后再去落上捉两只苗猪，明年又可到虎丘来卖肉猪了。